

费正清关于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 未能持久原因研究

张龙平

(暨南大学 社会科学部,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费正清认为当时新中国所实行的“一边倒”外交战略不会持久,最终注定要被调整。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费氏加强了对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并没有持久原因的研究,认为:(1)受到中国传统外交心态和外交战略的影响;(2)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世界和平和中美两国利益;(3)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苏关系“貌合神离”;(4)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相结合的苏联与新中国在文化上差异甚大。费氏的有关认识和研究既是他一直主张美国外交战略要贯彻“美国国家利益”和“现实主义”两大原则的体现,也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历史及亲身体验中苏两国不同文化氛围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费正清; 建国初; 中苏; 结盟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2)01-0113-04

费正清是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开创者,研究领域涉及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外经贸、宗教、民俗、中美关系、中外关系、中国学等^{[1]73},被誉为“美国中国学方面最大的学术企业家”^{[2]156},其中尤以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领域的研究为著,一直颇引起中外学人关注。近来,学界有关费正清学术思想和对华外交战略思想的梳理成为国人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学术史认识的主要途径。然在费氏整体“中—美”研究框架下,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中—他”、“美—他”的研究,而目前学界对此涉足不多。为此,本文特对费氏关于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未能持久原因的研究进行梳理。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新中国在外交上“必须一边倒”,亦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是倒向苏联。在美苏两极对峙的夹缝中,新中国正式实施了“一边倒”外交战略。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逐步放弃了倒向苏联一边的外交战略,转而实施“两条线”(既反美也反苏)外交战略,最终到了70年代初期又谋求与美国和解,开始拉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可见,新中国起初的“一边倒”外交战略,从1949年开始实施,到1959年被放弃,总共只维持约十年而未能持久下去。对此,费正清早在40年代末

和50年代就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绝不是莫斯科的傀儡”^{[3]383}，“中国和苏联是注定要拆伙的”^{[4]433}。当时他认为,新中国所实行的“一边倒”外交战略将不会持久,最终会被调整。而1959年以后尤其是60年代,中苏关系逐渐恶化,并最终于1969年正式破裂,这恰好印证了费氏多年以前的论断。在60年代至80年代,费氏又逐步加强了对中苏结盟关系未能持久亦即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未能持久原因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认识和研究既是他本人一直主张美国外交战略要贯彻“美国国家利益”和“现实主义”两大原则的体现,也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历史和体验中苏两国不同文化氛围的必然结果。

一、民族尊严:历史传统中的中苏关系

费正清认为,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未能持久与中国传统的外交心态和外交战略有关。

费正清认为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核心是朝贡制度,朝贡制度不仅是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础,而且还是近代中国与欧美国家关系的依据。早在1941年,费正清就与邓嗣禹一起发表题为《论清代的朝贡制度》的论文,开始专门探讨

收稿日期:2011-09-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编号:10YJAZH073)。

作者简介:张龙平(1980-),男,安徽安庆人,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清代朝贡制度以及当时的中西方关系。在1953年出版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条约口岸的开放》中,费正清指出:“无论由中国人还是由夷狄统治这个帝国,朝贡一直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方式。”在1968年出版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一书中,他进一步提出:“中国人与其周围地区,以及与一般‘非中国人’的关系,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优越的色彩。中国人往往认为,外交关系就是将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统一原则向外示范。因此,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像中国社会一样,是等级制的和不平等的。久而久之,便在东亚形成一个大致相当于欧洲国际秩序的中外关系网。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甚或‘邦际’这些名词对于这种关系似乎都不恰当。我们宁可称它为中国的世界秩序。”^{[5]124-126}很显然,就中国传统外交观念而言,所有这些“非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都要向中央之国的天子朝贡。中国的这一传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新中国建国初虽然外交上是“一边倒”,但中共不会成为“莫斯科的傀儡”,或者说“一边倒”外交战略不可能持久。

这种以本民族为世界中心的心态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具有自给自足的经济传统、不事扩张的外交传统和防御性的军事传统。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中国的军事策略长期以西北为重点,历代政府大规模的对外军事行动都集中在西北方向,外交活动也围绕着西北边疆的稳定。相比之下,海防在中国历史上向来就被轻视,即便有明朝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此后不久明清两朝闭关锁国政策,使得海防建设陷于停顿,晚清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建设曾经盛极一时,但仍因朝廷内部对新疆的重视和对沙俄的戒心而受到阻碍。因此,费正清得出结论为,新中国的外交战略承袭了两千年的外交传统,重陆地轻海洋;表面上“一边倒”,但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后采取了一系列现实举动,包括对苏联和蒙古戒备,这些仍是中国外交传统的继续^{[6]214}。

二、国家利益:中美关系 大局中的中苏关系

费正清认为,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未能持久与中美关系改善有关。40年代末和50年代,他就认为新中国最终会与美国接触亦即中美关系正常化,因为这既有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也符合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就中国而言,不仅维护本国安全,而且促使中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

作用;就美国而言,美国在东亚便能够解除后顾之忧。不过,在费正清的有关论述中,他更强调中美接触对美国国家利益有利。

二战时期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曾指出:“关于费正清,很值得一提的是他不是一位象牙塔内的学者,在我看来,作为历史学家他极不寻常,因为对他来说,历史一直延伸到昨日。”^{[7]230}出于对中国的了解,费正清一直主张美国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跟中共对话或达成某种谅解,并通过对话来化解敌意,寻求共同点,避免冲突。早在1946年,他就有这样的主张。费正清主张美国接近中共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对此,余英时先生在纪念费正清的文章《费正清与中国》一文中有精辟的论述。余英时认为:“尽管费正清一生倾向中共,他并没有丝毫‘同路人’的嫌疑,也从来不曾信仰过马克思主义。他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学院派自由主义者,……如果我们真的以为费正清对中国共产党一往情深,那又错得不能再远了。在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上,他彻头彻尾只有一个立场,即美国的利益。”^{[8]610}

余英时指出,早在40年代,费正清被派到中国担任美国新闻署驻华新闻处处长时,面对赫尔利来华之后美国采取扶蒋反共政策,费正清便痛感美国人对中国了解太少。40年代以后国民党失去人心,不能维持中国内部的秩序,这是有损于美国利益的。“因此,他开始主张抛弃国民党,另找一个可以在中国当家作主的替身。这样,他便看中了中共。”费正清“一心一意推动美国承认中共”,“希望把中共从苏联那边争取过来,使其不倒向苏联一方”^{[8]610}。当然,费正清并未放弃他的自由主义立场。他承认:他在美国坚决反共,但却必须对美国人宣扬中共的好处。只有如此,美国人才会接受中共。他用自由主义的标准来谴责国民党,其实只是一种门面话。这是由于国民党过去一方面不能不选择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而另一方面却念念不忘维持它根本办不到的“一党专政”。在费正清的内心深处,国民党的真正罪状恐怕不是不民主,而是不能在中国维持有效的统治。他认定中共通过党组织已彻底改变了中国以往一盘散沙的局面,表现出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所以他力主拉拢中共”。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仍然坚持美国承认新中国^{[8]611}。

费正清从国际社会需要、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美国自身利益)来进行观察,看到了中美最终接触的必然性。据此,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他就推断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不可能持久。

三、现实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苏关系

费正清认为,从当时中苏关系的现实考量,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未能持久与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苏关系“貌合神离”有关。费正清曾说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名副其实共产主义的,而且也是名副其实中国式的。”^{[3]389}“中国式”共产主义与“苏式”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结合,并不能消除内在脆弱的历史与现实分歧。

首先,费正清认为中苏关系的历史基础比较脆弱。中苏关系的起步是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搭建的,源于20年代派往莫斯科学习的留学生,虽然新中国跟苏联共产党人联系紧密,但却不一定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因为中共领导人始终不会忘记斯大林在20年代曾经给过他们错误的劝告,并且在1945年曾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条约,为其东北利益服务。一旦中国发展其自己模式的民族共产主义,这种关系就会解体,如果有朝一日中国需要经济外援,美国及其盟国可以比苏联提供更多的话,这种解体还会提速^{[9]371}。

其次,费正清认为中苏关系的现实基础也并不牢固。他认为,1950年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经过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达成的,在短期内的军事战略和经济援助的条件上,却存在明显分歧。从军事战略上看,“那时北京似乎并不期望同苏联武装起来的北朝鲜一道于1950年6月侵略南朝鲜。相反,中共显然是想攫取国民党手里的台湾。”^{[10]369}但美国第七舰队到达台湾海峡阻止两边采取军事行动,此后中国的战略转为保证从日本接管过来的主要工业基地的安全。从经济援助上看,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以付出代价为条件。1950年,按照东欧模式设立了一些中苏合营股份公司,以开发新疆的矿业和建立苏联工业发展急需的配套产业,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而且苏联强调重工业而牺牲农民的模式,并不真正适合中国的情况^{[10]368-372}。

第三,中苏之间关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主权之间关系的理解存在分歧。费正清认为新中国的“一边倒”外交战略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而50年代中期以后赫鲁晓夫理解的“一边倒”是苏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全面占领中国。费氏认为1957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表达的有关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至高地位的溢美之词,其实并不是毛泽东的内心感受,而是基于中苏之间有许多科技交换协议(包括协助制造原子弹)

存在,以及几万名苏联专家援助等现实国家利益。此后,双方关系就开始出现裂痕,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宣称,人民公社制将可使中国比苏联先走到共产主义社会,这实际上是向苏联作为共产主义的领袖提出挑战,很令苏方恼怒。赫鲁晓夫于是公开批评大跃进,认为中国领导人是浪漫的路线偏差者。另外,中共于1958年计划炮轰金门时对苏方未事先通气更使赫鲁晓夫怒不可遏。1958年台海危机中,美国与中国可能会发生战争,苏联表明不支持中共。此后不久,赫鲁晓夫突然把派在中国的苏联技术专家撤回。中共不久就对苏联发起意识形态炮轰,抨击苏联修正主义,苏方也照样回敬。到60年代末,中苏两国的争执公诸于世,双方互指对方背叛了正统的共产主义信仰。中苏之间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促成的结盟,最终以意识形态的分歧走向破裂,名义上是意识形态,其实是国家利益的较量^{[4]434-435}。

四、情感碰撞:与中苏两国学人交往的体验

根据与中苏两国学人交往的情感体验,费正清认为,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未能持久与共产主义及极权主义相结合的苏联和新中国在文化上格格不入有关。

费正清上述判断不仅是他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特征的学术认知,也是他长期与中国学人接触的情感体验。费正清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与不少的华人学者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早在30年代,费正清首次来到中国,便与胡适、陶孟和、丁文江、蒋梦麟、傅斯年、钱端升、李济、翁文灏、费孝通等曾留学英美的学者有了来往。在中国,费正清结识了终生引以为傲的知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梁思成夫妇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极深厚的造诣,又接受过西方正规的高等教育,在同他们中西合璧、古今交汇的长期来往、谈论中,费正清犹如被带上了一个高原,俯瞰盆地中的田畴,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精奥微妙处大有领会。这使费正清突破了近百年来一直困惑着无数中国人的“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等形而上怪圈,产生出一种较为成熟的思想认识。他说:“通过他们的目光,我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化的一体化问题,即需要扬弃过去的糟糠,对外来事物需要区别什么该保存,什么该借鉴。这是一个尚待开辟的双重文化领域,没有多少人曾经如此深入地、如此自觉地钻研下去。”^{[11]35}

在中国,费正清还遇到引领自己步入中国历

史研究殿堂的引路人——蒋廷黻先生。费正清虽与蒋廷黻并无师承关系,但刻苦自学的费正清“以各种方式得到他的帮助”。他说“我与蒋廷黻有着诚挚的私人关系”,在蒋帮助下,1934年7月,费正清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天津条约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

而在美国,费正清的身边还有一批热心的华人同事和学生,如邓嗣禹、刘广京、徐中约、郝延平、余英时等。在费正清的身边中国学人占有极重份量,与中国学人的友好交往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在自传体回忆录中曾这样评价:“中国10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宝库。他们的那些卓有成就的中国学者早已遍及我们的高等学府,他们有希望成为新的世界机构的骨干人员。……中国革命与其说是我们的仇敌,不如说是我们的朋友。它是独特的、只顾自己的,并不向外侵略的。当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时,我们能互相帮助。”^{[3]554-555}

与中国以及中国学人友好交往的体验不同,费正清与苏联人的交往却是“令人沮丧的”,他在自传中使用“与苏联人交往的失败”来表达自己对苏联的印象^{[8]539}。1960年费正清访问过苏联,无论是苏联百姓的生活面貌,还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都给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费正清认为苏联的极权主义已经渗透进普通百姓的生活。他在街上看到的是萎靡不振的脸孔,其中许多仍显露出战争带来的清苦生活的迹象。他认为“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礼貌,这无疑是在害怕极权主义制度的结果,它使你不相信其他任何人”。而当地的报纸也是经过“精选的”,内容是“缺乏创见,带上色彩,说教性和微不足道”^{[12]273-274}。

在学术研究方面苏联也受到极权主义的政治影响。费正清说:“俄国的历史学家们完全致力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考框架,此外只不过打算将封建主义解释为地主所有制,并给陈腐的言辞以新的意义,以便他们掩盖历史真相时有某种程度的准确性。作为科学的历史观,也许倾向于与这种教条相分离。他们受到严格的政治控制,对美国的多元化制度相当无知。”俄国同事并未“像我们的人所做的那样,纠缠于文献。相反,他们在一个框架内撰写论文,这等于在训练注释”。因此,苏联学者的论文质量存在问题。

因此,费正清基于与苏联学人交往的不良印象得出结论:“极权主义生活留下的混乱,要比中国共产主义忧郁得多。乌托邦思想与官僚政治实

践的古怪结合,创造出一种‘坏人飞黄腾达,好人受罪遭难’的局面,我们已经看到未来,它在痉挛。”^{[12]275}

从费正清与中苏两国学人交往的情感体验来看,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相结合的苏联与新中国在文化上格格不入,因而双方的同盟关系不能持久。相反,他相信,中美这两个国家及其代表的文化是能够共存的,关键在于相互了解,他的一个始终不渝的信念是,如果美国人需要一个更安全的未来,那么就要使他们了解中国,并且用这种知识来认识中美关系。

费正清是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参与政府决策的美国幕僚。他对新中国起初“一边倒”外交战略及当时中苏结盟关系的认识和研究,既体现了其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也反映了其国家立场和个人情感的主观愿望。尽管从当今中美关系现实的角度来看,他当时的那些论断和研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种种不足,但在今天仍然可为我们分析新中国外交和中美关系问题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因此,费正清关于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未能持久原因的研究对当今中国学界从事这方面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 胡大泽. 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2] 陶文钊. 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J]. 历史研究, 1999(1).
- [3] 费正清.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1.
- [4] 费正清. 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M]. 薛绚, 译. 台北: 正中书局, 1994.
- [5] 权赫秀. 中国古代朝贡关系研究评述[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5(3).
- [6] 邓鹏. 费正清评传[M]. 成都: 天地出版社, 1997.
- [7] 保罗·柯文, 默尔·戈德曼. 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M]. 朱政惠, 陈雁, 张晓阳, 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0.
- [8] 费正清. 费正清自传[M]. 黎鸣, 贾玉文, 等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 [9] 费正清. 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M]. 刘尊棋,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 [10] 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M]. 张理京,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 [11] 陈祖怀. 费正清与中国[J]. 史林, 1991(3).
- [12] 保罗·埃文斯. 费正清看中国[M]. 陈同, 罗苏文, 袁馨铭,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 梅全亮]